

世界中篇小说经典

I 14

279.6

版社



世界中篇小说经典

日本卷

文洁若 主编

WENJIERUO

ZHUBIAN

春风文艺出版社

CHUNFENGWENYICHUBANSHE

辽新登字 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中篇小说经典/江枫,古继堂主编.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6.10

ISBN 7-5313-1655-2

I. 世… II. ①江…②古…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世界 IV. 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16367 号

世界中篇小说经典·日本卷

Shijie Zhongpian Xiaoshuo Jingdian ribenjuan

主 编:文洁若
责任编辑:王 烨
责任校对:唐惠凡
封面设计:杜凤宝

出 版 者:春风文艺出版社
邮 编:110001
地 址: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电 话:3864927

印 刷 者:鞍山市第三印刷厂
地 址:鞍山市旧堡路同兴街 49 号

发 行 者:春风文艺出版社

字 数:630,000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24 $\frac{1}{4}$
印 数:1—6000
版 次:1996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199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13-1655-2/I·1448
(全八卷)定价:260.00 元

《世界中篇小说经典》编委会

主编

江 枫 古继堂

分卷主编

文洁若（日本卷）

文美惠（英国卷）

吕同六（意大利卷）

李文俊（美国卷）

陈中义（拉美卷）

张佩芬（德语国家卷）

郭家申（俄苏卷）

桂裕芳（法国卷）

策划 王 烨

编委 王 烨 文洁若 文美惠 古继堂 江 枫

吕同六 刘烈恒 李文俊 李勤学 陈中义

张佩芬 郭家申 桂裕芳

本卷序

文洁若

1868年日本进行了一场划时代的资产阶级改革运动——明治维新。从那以后，日本建立起近代化国家，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明治初期，福泽谕吉等人展开了启蒙活动，社会上却依然流行着滑稽小说系统的小市民文学。值得一提的乃是一些政治小说，系出自领导自由民权运动（开始于19世纪70年代、历时十几年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政治家或政论家之手。他们之所以写作，大都是为了传播建立在人生下来就是自由平等的这一天赋人权论上的政治理想。其中东海散士所著《佳人奇遇》（1885）一书曾由梁启超译过来，在我国出版。直到19世纪80年代中叶，小说家们仍然自称为“戏作者”，认为自己的作品只不过是笔墨游戏，社会上也把他們看作靠舞文弄墨糊口的文人。

这时，日本文学评论家坪内逍遙（1859—1935）的《小说神髓》（1895—1896）问世了。坪内自幼接受严格的中日古典文学教育，十四岁入名古屋的英语学校，开始通过英语接触西方文化，先后翻译了司各特的小说和《莎士比亚全集》。在19世纪下半叶的西方文艺思潮影响下，坪内在《小说神髓》中强调，要通过性格特征及心理活动来刻画人物。他还

2 世界中篇小说经典

提出，小说应该采用写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并如实地描绘现实。他写道：“说到底，小说的主旨在于写人情世态。运用新奇的构思这条线巧妙地织出人的情感……”^①

明治维新后十几年间，旧的思想意识依然支配着小说界。为了针砭时弊，坪内以介绍西方世界对小说的看法来抬高小说的地位。作为最早的有系统的启蒙著作，他这部小说论对于推动日本现代文学方面曾经起过不可磨灭的作用。

日本新文学是在日本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在日本民族丰富多采的文学遗产的基础上，吸收西方资产阶级文学和中国古典文学的营养，随着日本资产阶级的成长壮大而发展起来的。在整个日本文学史上，言文一致的近代文学占有重要位置，其小说、诗歌、戏剧、散文随笔等都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从中闪现出时代变动的投影。

这个集子里选了明治、大正、昭和三个时代一个世纪（1891—1958）以来日本文坛上各个流派具有代表性的十一位作家的作品各一篇，题材广泛，风格和技巧各具特色，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时代风貌。

当然，任何国家的文学都不能仅仅根据其中篇小说去掌握它的全貌。了解一个作家也是如此。比如日本杰出的作家夏目漱石、石川达三、井上靖、大江健三郎等人的成就，就主要表现在长篇小说方面。因此，尽管这里也收了他们的中篇，但他们的代表作乃是他们各自的长篇小说《我是猫》（1905）、《风中芦苇》（1951）、《冰壁》（1957）和《万延元年的足球赛》（1967）。

^① 见《小说神髓》，第26页，刘振瀛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

纵观日本近代文学的发展，流派名目虽然繁多，但总的来说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是倾向于二叶亭四迷开创的现实主义的作家，二是倾向于以森鸥外为代表的浪漫主义作家。

二叶亭四迷的长篇小说《浮云》(1887—1890)是在坪内逍遙的小说改良论的启迪和近代俄罗斯文学的影响下，用新颖的言文一致体写成的，为日本现代白话文学的滥觞。作者成功地描绘了在半封建明治官僚政权下，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由于不肯违心地巴结上司而被革职。《浮云》问世时，只获得一部分有识之士的赞赏，若干年后，人们才普遍地从时代意义上来理解此作。

19世纪90年代，日本文学史上出现了红露逍鸥时期。以《金色夜叉》(1897)的作者尾崎红叶为首的砚友社以及幸田露伴的作品在文坛上占统治地位。坪内逍遙在长篇小说《一读三叹当代书生气质》(1885—1886)中实践了他在《小说神髓》中提出的理论。这是日本近代最早的一部写实主义作品，然而人物有些概念化。从德国留学回来的森鸥外，则以充满浪漫情调的《舞姬》(1890)等作品使读者耳目为之一新。

幸田露伴的中篇小说《五重塔》(1891)的主题赞美艺术的永恒不朽和艺术创造者的不屈不挠的精神。主人公十兵卫是个性格耿直朴实的木匠，为了建起一座五重塔，他废寝忘食。塔刚竣工，狂风暴雨就肆虐了一整夜，塔却经受住大自然威力的考验，巍然屹立。露伴借这样的故事情节来宣扬人定胜天的信念。文中对暴风雨的描写十分精彩，堪称明治文学的传世佳作。

砚友社是1885年以尾崎红叶为核心而组织起来的文学团体，对明治时代中期的文坛产生过很大影响。泉镜花于1881年11月拜尾崎为师，在尾崎家住到1895年2月，成为

砚友社出身的作家。尾崎对镜花的热心栽培，在日本文学史上传为佳话。镜花关心被压在社会底层的艺妓的命运。在他那些以惨遭蹂躏的艺妓生活为题材的作品中，写得最出色的要算是《汤岛之恋》(1899)了。这部中篇结构严谨，故事是环绕着神月梓和艺妓蝶吉之间曲折的爱情展开的，对话和叙述中不时夹以往事回忆，烘托出梓的内心矛盾。1899年，在一次新年宴会上，镜花和艺妓桃太郎一见钟情。《汤岛之恋》是当年12月问世的，在阿蝶身上，我们依稀可以看到桃太郎的影子。桃太郎原名阿铃，恰好和镜花九岁死去的生母同名。镜花后为阿铃赎身，与她同居。然而由于严师尾崎坚决反对，镜花被迫同阿铃分手。直到尾崎于1903年去世，镜花才和阿铃正式结为夫妻。

历史进入20世纪，岛崎藤村的《破戒》在日俄战争结束的次年问世。作者在这部长篇小说中揭露了野蛮的身份制度加给日本部落民的桎梏，通过觉醒了的主人公同封建残余之间的冲突，从广阔的视野提出尊重人权的要求，因而也是一部优秀的社会问题小说。同年问世的还有夏目漱石的短篇小说《哥儿》和中篇小说《旅宿》。夏目除了具备东方文化的教养外，还灵活地吸收了西欧近代社会尊重个性自由的思想。在《哥儿》里，夏目以写实主义手法描绘了一个为人憨厚、有正义感的教员对庸俗丑恶社会的反抗。在本书所选的《旅宿》中，作者则以超然物外的态度描绘了一个脱离现实、超越人情的美好世界。

伊藤左千夫的《野菊之墓》(1906)以江户川切渡附近的田园风光为背景，描写了十五岁的政夫同比他大两岁的民子之间一种矜矜、纯洁的爱情。在封建礼教的压迫下，民子违心地嫁给了自己并不爱的人，死于小产。在艺术手法上，作

者采用日本短歌的形式，赋予了作品以咏叹格调。

一般认为森鸥外是日本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然而他的个别作品（如《山椒大夫》和《高濑舟》）也表现出明显的现实主义倾向。继他之后，其作品富于浪漫主义色彩的作家，还有唯美派兼恶魔派的谷崎润一郎、新现实主义作家芥川龙之介以及新感觉派作家川端康成等。

近代日本文学曾产生过自然主义流派，影响深远。我们知道，在欧洲，法国作家左拉曾于19世纪60年代发表过一篇论文，树起自然主义的旗帜。1894至1895年间，这股文艺思潮也传到日本，于大约十年间（1902—1910）形成声势浩大的文学运动，其全盛时期为1908至1910年间。

白桦派反对自然主义那种抛弃理想的纯客观主义描写，主张肯定人生和自我发展，具有比较鲜明的人道主义和理想主义倾向，为日本近代文学留下了不少优秀的作品。武者小路实笃是白桦派的主要作家之一。他年轻时最仰慕托尔斯泰，作品中人道主义思想较为浓重，《友情》（1919）就是他青年时期的代表作。主人公野岛的朋友大宫很讲义气。尽管他和野岛都爱着杉子，但他认为既然野岛先对他所热恋的杉子表示了爱慕，出于对野岛的友谊，他就故意做出一副对杉子冷漠的样子。及至他得悉杉子真正爱的却是他时，爱情还是战胜了友谊。此作立意清新，刻画细腻，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光明的美好憧憬。

历史进入20至30年代，无产阶级文学蓬勃兴起。在世界革命文学运动中，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是颇有成绩的，从中涌现了不少优秀的革命作家。这个运动理论上的领导人是藏原惟人（1902— ）。小林多喜二则是受藏原的文学理论影响最深、成就最高的作家，《为党生活的人》（1932）为其

代表作。主人公“我”伪装成临时工潜入一家军需工厂，反对裁减工人，并进行反对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我国东北的斗争，小林于1933年2月20日被捕，遭到法西斯警察的严刑拷打，当天就被残杀。

以才女著称的宫本百合子自幼酷爱文学，深受列夫·托尔斯泰等人道主义精神的影响。她以描绘自己的恋爱和婚后纠葛的长篇小说《伸子》奠定了作家的地位。收在本集中的中篇小说《时时刻刻》(1933)与《为党生活的人》有异曲同工之妙。主题是作者于1932年被捕时，作为一个革命者怎样坚贞不屈，顽强地进行抵抗。原作不少处措词尖锐，如：“侵略满洲的战争也罢，随之而进行的残酷的掠夺也罢，战争的下令者×××也罢，人民都只得对之抱三不——不看，不听，不说——的态度，并被当作奴隶来压榨，直至送死。有理性的人是不可能接受的。我感到，愤怒和憎恨在我的身躯内嘎吱嘎吱作响，就像是踏在冻雪上似的。”由于像这样强烈抨击法西斯军国主义者的段落比比皆是，此作被检查当局严禁发表，所以直到战后于1951年初次问世。宫本百合子在坐牢期间身体备受摧残，以致52岁上就因患急性脑脊髓炎菌败血症而英年早逝。

新感觉派是作为无产阶级文学的对立面应运而生的，他们打起反对无产阶级文学的旗号，试图以崭新的艺术手法进行创作。横光利一和川端康成就是这一流派的中坚作家。川端康成的地位尤其重要。他重视艺术技巧，委婉的笔致中往往蕴含着深邃的诗情画意，颇富于感染力。他早期的作品对舞女、艺妓、女招待等下层妇女寄予同情，其中以短篇小说《伊豆的舞女》(1926)最为闻名。它描写“我”(作者的化身，一个高中学生)和十四岁的舞女阿薰之间的一段纯真感情。

1968年10月18日，川端康成以《雪国》与另外两篇《千只鹤》（1949—1951）和《古都》（1961—1962）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评语中说他用“敏锐非凡的感情，高超的文学技巧，表现了日本人内心美的精华。”在授奖仪式上，川端以《我在美丽的日本》为题发表讲话，畅述了不同于西方的东方文学中的艺术美感。川端花了十二年时间（1935—1947）呕心沥血写成的《雪国》（1935—1947）是他的代表作，标志着他的艺术技巧达到了顶峰。作者在保持日本文学传统的基础上，灵活地采用了西方的意识流手法，使二者浑然融为一体。法国作家福楼拜谈到自己所塑造的包法利夫人这个形象时，曾说：“艾玛就是我。”无独有偶，川端康成也说：“与其说我是岛村，毋宁说我是驹子。”^①

雪国的艺妓驹子是作者精心塑造的人物，她虽堕入风尘，却出污泥而不染，孜孜不倦地习艺，坚持记日记，力求上进，渴望过上像样的生活。她明知岛村不会为她而牺牲自己的家庭，却还是把一腔挚爱倾注在岛村身上。

加拿大的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鹤田欣也认为泉镜花的《高野圣僧》（1900）同夏目漱石的《旅馆》、川端康成的《雪国》以及安部公房的《砂女》（1962）有个共同点。由于日本近代化的过程太迅速了，使敏感的作家们难以接受，遂创造了这样一个梦幻的世界。^②《高野圣僧》写一位高僧年轻时的险遇。他在深山中迷了路，觅到一茅屋借宿。女主人是个美女，她丈夫却是个白痴。奇禽怪兽围着茅屋号叫到天明。

① 《独影自命》，见《川端康成全集》第38卷，第388页，新潮社1983年版。

② 《“彼方”的文学》，见《文学中的“彼方”》，第34至35页，国文学研究资料馆编，明治书院1985年版。

事后才知道，都是美女施展魔术，把那些存心不良的男人变成野兽的。他不断念诵《陀罗尼经》，才得以安然无恙地离开那里。《砂女》的主人公仁木是中学教员。有一次，他偶然闯进一座被沙子埋起来的村庄，在沙丘下的房子里投宿。房主是位三十来岁的寡妇。天明后他才发现，房子被高出房檐三倍的沙墙所包围。他发明了一种能够在沙穴底下蓄水的设备。后来虽然有了逃脱的机会，但为了向村民介绍存水器的事，他还是继续留了下来。一晃儿七年过去了，仁木终于被宣布为失了踪。

在这四个中篇中，作者分别创造了迷离扑朔的神秘气氛，读起来离奇而又逼真。

“九·一八”事变（1931）至日本战败（1945），是日本近代史上最黑暗的十五年。日本垄断资本与军事独裁政权狼狽为奸，对内残酷镇压，对外疯狂侵略。官本百合子、西泽隆二等作家始终大义凛然，高举反法西斯的旗帜，保持了高风亮节。另有一些文学家则用象征手法隐晦地批判了日本的不义行径。

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石川达三以中央公论社特派记者身份来到我国，跟随着日本侵略军从石家庄进犯到南京，目睹日寇惨无人道的烧杀抢掠，尤其亲临侵占南京后所进行的大屠杀现场。回国后，他就在当年3月号的《中央公论》上发表短篇小说《活着的士兵》。当局立即查禁了该期杂志，认为此作记述了“皇军士兵杀戮非战斗人员，进行掠夺以及军纪松弛等状况”，并以“违反新闻纸法”、“扰乱安宁的秩序”的罪名，判处作者以四个月监禁、缓期三年执行。石川达三被强制性地“顺应国策”，迫不得已而于1939年发表了《武汉作战》。

日本投降后，历史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反战和自由民主的思潮席卷全国。作家们从长期禁锢中解脱出来，纷纷提笔揭露军国主义者的罪行。梅崎春生的短篇《樱岛》(1946)反映了士兵的厌战情绪。大冈升平的中篇小说《野火》(1948)则写了日本侵略军在菲律宾战场上陷入困境后，杀掉战友吃人肉裹腹的情节，不遗余力地暴露了“皇军”的野蛮性。

战后石川达三一方面因《活着的士兵》而备受称许，却又因《武汉作战》遭到指责，处境很是尴尬。他在长篇小说《风中芦苇》(1949—1951)中反映了日本知识分子不得不在夹缝中求生存的苦衷。主人公苇泽悠平是以《中央公论》杂志社社长长岛中雄为原型的。作者刻画了战争期间苇泽怎样通过制定杂志的方针和所刊文章的内容，与法西斯当局进行斗争。

石川达三还在一些中短篇中反映了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侵略战争带给本国老百姓的苦难，这个集子里所选的《风雪》就是有代表性的一篇。那场祸国殃民的战争使前陆军少尉中原宏的右腿被截肢，生活无着，终于自暴自弃，寻了短见。钢琴家高木则失掉了右臂，未婚妻因而背弃了他，投入另一名男子的怀抱。作品通过这两个人的悲惨遭遇，揭露了法西斯势力所造成的灾难，以激发日本民众对军国主义的深仇大恨，将日本历史上这一惨痛教训永远铭记心头，从而使一小撮军国主义者飞扬跋扈的时代一去不复返。

另一位活跃于战后的作家井上靖总是及时地抓住发生在日本社会上的重大政治或社会事件，用小说的形式把它们真切生动地表现出来。他的作品能够紧密地贴近现实，反映社会生活，因而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的倾向，大多富于社会意义。他的小说涉及面颇广，日本甲南大学教授永丘智郎曾写

道：“井上靖的功绩在于，他把日本战后经济成长后所形成的人与人的关系尽情地写进了文学作品。因此，倘若能将他的作品有系统地介绍到海外去，就可以使人深刻地认识日本战后的历史。”^①

井上靖的代表作《冰壁》(1957)就是根据1955年1月发生的“尼龙索事件”写成的。该书出版后，以山岭为背景写过十二卷小说的日本山岳会副会长深田久弥称誉道：“作者用登山这一特殊题材写出如此充满魅力和戏剧性的作品，我衷心表示钦佩。”^②

本集中所选用的《猎枪》(1949)也表现了作者丰富多采的艺术手法。他采取的是一个崭新的角度，构思新颖，情节安排得巧妙，行文不落窠臼。他借几封信写出一场男女爱情的纠葛，凄切哀婉。

明治维新后，富于进取心的日本民族大量引进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日本人历来重视智力投资，培养人才。由于教育普及，文化水平较高，从人口比例而言，能写作的自然也就多了。作家们要求精道外语，要求通过日译本，广泛地阅读各国文学作品，吸收西方各种文艺思潮，从而开阔了视野。他们在继承古典文学传统的基础上，不时地写出散发着奇光异彩、具有独特民族风格的作品。

1994年10月13日，大江健三郎继川端康成之后，以《个人的体验》(1964)和《万延元年的足球赛》(1967)这两部长篇小说成为第二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作家。然而

① 《井上靖的文体》，见长谷川泉编《井上靖的文体》，第399页，东京南窗社1974年版。

② 见《东京新闻》，1957年11月20日。

当日本文部省即日召开紧急会议，表示要把文化勋章授予他时，他却在报纸上撰文，声明自己是“战后民主主义者”中的一员，文化勋章对自己来说不合适，从而毅然谢绝了。拒绝接受由天皇在皇宫颁发的这一体现国家最高荣誉的奖，这在日本确实是破天荒的壮举。

大江年仅十岁时，适逢日本投降。他问老师：“大人们说要废除天皇制，是真的吗？”老师立即对他拳打脚踢，还把他的母亲叫来，狠狠地训斥了她一顿。大江生长在被原子弹污染了的土地上，他的长子又偏偏是个弱智儿。这样，他在作品里一方面对核武器发展以及日益严重的公害对人类生态所构成的威胁充满了忧患意识，另一方面又对残疾人表示了关切。

1960年5月，大江作为日本文学家代表团的成员访问我国，在北京慷慨激昂地做了支持反对日美“安全条约”的广播演说。回国后，大江以持刀杀害日本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的右翼少年山口二矢为原型，写了《十七岁》和《政治少年之死》这两个短篇小说，均于1961年1月发表在杂志上。由于后者涉及天皇制的部分激怒了日本右翼势力，刊载它的《文学界》立即受到恫吓，被迫在未征得作者本人同意的情况下，公开赔礼道歉。这篇具有时代意义的小说，至今未能收入大江的文集。

1994年10月13日，瑞典诺贝尔文学奖评会在对大江健三郎的授奖评语中说，他之所以获奖，是由于他在作品中“以诗的力量创造了一个想象的世界，在那里，生命与神话凝聚在一些，构成一幅当今人类困境中惶惑不安的图画。”当年12月10日，在授奖仪式上，评委会主席又指出，大江的作品“充满着崭新的观点和简洁的意象，有着诗一般的‘怪诞现实

主义’。……在常常变形的众多人物和事件之中，最终呈现为纯粹的人文主义者形象，我们一切人都关心和为之感动的形象”。

在授奖仪式上，大江以《我在暧昧的日本》为题发表讲话。他认为当年川端康成在获奖时所发表的题为《我在美丽的日本》的讲演，“极为美丽，同时也极为暧昧”。接着，他就在“暧昧”一词上大作起文章。他指出：“我觉得，日本现在依然在持续着开国120年以来的现代化进程，正从根本上被置于暧昧（ambiguity）的两极之间。而我，身为被刻上了伤口般深深印痕的小说家，就生活在这种暧昧之中。……暧昧的进程使得日本在亚洲扮演了侵略者的角色。……在亚洲，不仅在政治方面，就是在社会和文化方面，日本也越发处于孤立的境地。

，“就日本现代文学而言，那些最为诚实的‘战后文学者’，……在亚洲地区，……对日本军队的非人行为做了痛苦的赎罪，并以此为基础，从内心深处祈求和解。我志愿站在表现出这种姿态的作家行列的最末尾，直至今日。”

接着，他又语重心长地指出，日本人“作为曾践踏了亚洲的侵略者，……染上了历史的污垢”。^①

大江健三郎的代表作为《万延元年的足球赛》（1967）。这部长篇小说以四国的山峡森林为背景，写出了都市与乡村、西方与东方的矛盾。作品融知识、激情、梦幻与野心于一炉，入本三分地描绘了在混乱的世界里人与人的关系。日本评论家松原新一认为，大江的基本主题是把个人从“内在的地狱”中解救出来。

^① 引自《我在暧昧的日本》，许金龙译，《世界文学》1995年2月号。

大江的长子光生于1963年，是个患先天性脑障碍的弱智儿。大江为之悲痛至极，根据亲身感受写了《个人的体验》(1964)。这部长篇小说的主人公因爱子患有残疾而闷闷不乐，自暴自弃，但终于醒悟过来，打起精神之尽做父亲的责任。在现实生活中，经过多年的努力和各方面的探索，他和妻子已奇迹般地把先天不足的儿子培养成一位有成就的作曲家。更难能可贵的是，作者总把他个人的体验与民族及国家的前途联系在一起。

去年适值日本投降50周年，大江健三郎在美国《纽约时报杂志》(1995年7月2日)上发表了题为《否认历史导致日本无能》一文，一针见血地抨击了日本政府对当年发动侵略战争不认罪的态度。文章指出：“日本要想在21世纪的亚洲成为一个真正的伙伴，就必须建立起一个基础，俾使本国既能批评邻国，也能听取邻国的批评。为此，日本必须为其侵略行径道歉，并作出赔偿。这本是起码应该做到的，大多数有良知的日本人对这一点业已达成共识，然而竟遭到保守党派、政府官员和工商界领导人所组成的联盟的反对。……”

文章作者最后痛心疾首地说：“我的残疾儿子每遇到新的困难，我的家人和我就都热情地帮助他进行康复治疗。日本和日本人必须致力于亚洲的康复。在我国整个现代化进程中，尤其是在现代化达到顶峰的侵略战争中，我们丧失了成为亚洲一部分的权利，我们一直是在没有重新获得这种权利的情况下生存着。

“不进行这种康复治疗，我们就永远不能放弃我们对邻国所采取的暧昧态度，也不能消除我们与他们之间在关系上的不实在感。如果说我相信这种感觉可以消除的话，那并不是因为我预料到政府的态度会发生重大的改变，而是因为我发